

迁入地宗族文化如何影响移民创业？ ——基于社会融入的视角

马俊峰 徐子尧*

摘要 本文利用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构造大姓占比指标测度迁入地宗族文化,结合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考察迁入地宗族文化对移民创业的影响。研究表明,迁入地宗族文化通过社会交往、文化接纳和身份认同三种社会融入途径,减少了移民创业的可能性与意愿,尤其是对跨省级行政区流动、跨方言大区流动、“乡—城”流动和流入南方地区的移民创业抑制作用更明显。在控制遗漏变量、采取工具变量法和大量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旧成立。

关键词 宗族文化 移民创业 社会融入

一、引言

中国正处于城镇化加速推进的阶段,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城镇人口比重为63.89%,比2010年提升了14.21%。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不仅有助于提高外来人口就业收入和公共服务可获得性,扩大城镇消费群体、优化消费结构和释放消费潜力,还有利于提高城市创业活跃度,激发维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动力。近年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城镇化问题,确立了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发展道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道路的延伸,关键在于促成外来移民全面融入迁入城市,实现外来移民“职业、地域和身份”的三重转变(陈斌开和陈思宇,2018)^①。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2020年中国城镇常住人口9.02亿人,城镇户籍人口6.41亿人,非城镇户籍外来移民2.61亿人^②,如果要达到发达国家80%—90%的城镇化率^③,至少还需2.28亿农民进城定居。如何缓解规模近5亿的外来移民融入城市社会过程中面临的正式与非正式制

* 马俊峰,广西大学经济学院,E-mail:834044906@qq.com,通讯地址: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西乡塘区大学东路100号,邮政编码:530004;徐子尧(通讯作者),四川大学经济学院,E-mail:ziyaoxu1218@163.com,通讯地址: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一环路南一段24号,邮政编码:610065。鸣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一般项目(21BJY235)的资助。感谢中国劳动经济学者论坛理事会和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共同举办的“中国劳动经济学者论坛第二十一次季会”与会学者的评论和建议;感谢匿名审稿人的宝贵修改意见,文责自负。

① 三重转变:职业上从农业到非农业、地域上从农村到城镇、身份上从农民到市民的转变。

② 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2020年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5.4%,可得城镇户籍人口约为6.41亿人。

③ 根据联合国人居署数据,2020年,亚洲发达国家中日本和韩国城镇化率分别为91.78%和81.41%,欧洲发达国家中丹麦、瑞典、芬兰、英国、挪威、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城镇化率分别为88.12%、87.98%、85.52%、83.90%、82.97%、98.08%、92.24%和91.45%,美洲发达国家中美国和加拿大城镇化率分别为82.66%和81.56%。即便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巴西城镇化率也为87.07%,比中国63.89%的城镇化率高23.18个百分点。

度约束,不仅事关社会融合和新型城镇化发展道路等中短期目标,更关乎社会长治久安和共同富裕等远景目标。

从制约移民融入城市社会的正式制度来看,户籍壁垒起直接和主导作用^①。户籍制度导致了城乡二元分割,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万海远和李实,2013),降低了移民收入水平、阻碍了移民创业(Chen和Hu,2021)。为了加速推进城镇化,2014年开启了新一轮户籍制度改革,通过取消“农业”与“非农业”户口的区分和执行新迁入证制度等获得了部分成效,可以预见未来阻碍城镇化的制度性障碍会逐渐减少。随着正式制度约束的减轻,城乡一体化水平逐渐提高,城乡融合面临的未来挑战更多的来自文化等非正式制度约束。其中,较为突出的矛盾是依托传统乡土社会而生的“乡村宗族文化”与依赖现代城市社会而存在的“城市宗族文化”之间的碰撞。如何化解这种“文化冲突”引起的矛盾,推动移民融入城市社会,已成为各级政府在推进新型城镇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问题。

现代城市社会是陌生人构建在社会契约基础上的有机体,主张个体独立,人际关系主要受正式制度影响(Greif和Tabellini,2010)。不同于现代城市社会,传统乡土社会建立在深厚的血缘关系基础上,主要借助非正式制度维护社会成员关系。两种不同形态的文化能否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实现有机融合?又是否会通过社会融入渠道作用于移民创业行为与意愿?这是本文主要的关注点。现有文献聚焦于考察方言技能(Wei等,2019)、企业家资本代际传承(周敏慧等,2017)等微观特征和劳动力市场户籍歧视(Chen和Hu,2021)、地区差距(叶文平等,2018)、城市包容性(周颖刚等,2020)、移民多样性(余玲铮等,2021)等宏观因素对移民创业的影响,鲜有研究关注流入地宗族文化如何影响移民创业。宗族作为儒家伦理在基层社会组织层面的表达,其形成的宗族文化突出族内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注重圈子内协调合作,强调家庭政治、经济地位和族众凝聚力,具有明显的排外性特征,可能会阻碍外来人口融入本地,进而抑制异地创业。

为了检验上述猜想,本文借助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构造地级市层级大姓占比指标测度迁入地宗族文化,结合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检验迁入地宗族文化对移民创业选择与创业意愿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以大姓占比表征的迁入地宗族文化显著降低了移民创业的可能性和意愿。在采取控制遗漏变量和利用工具变量法解决内生性问题后,结论依旧成立。机制检验发现,迁入地宗族文化主要通过社会交往、文化接纳和身份认同三种社会融入渠道抑制移民创业。异质性分析表明,迁入地宗族文化对移民创业的负向影响在跨省级行政区流动、跨方言大区流动、“乡—城”流动和流入南方地区的群体中更明显。与既有文献相比,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 丰富了宗族文化经济后果和移民创业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一方面,过往研究聚焦于探讨宗族文化在乡村中发挥的作用,如促进农户外出务工(郭云南和姚洋,2013)、推动农户创业(郭云南等,2013)、缩小农村内部收入差距(郭云南等,2014)和增

^① 户籍制度导致外来民工难以融入城市社会,市民化进程较为滞后。《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显示,大约2.34亿农民及其随迁家属不能享受教育、医疗、养老和保障性住房等城镇居民的基本公共服务。

加农村公共品供给(王丹利和陆铭,2020)等,仅个别学者从城市视角考察了籍贯地宗族文化对移民就业的影响(陈斌开和陈思宇,2018),少有研究关注到迁入地宗族文化如何影响移民创业。另一方面,剖析影响移民创业的因素是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重要议题之一,过往研究较为重视考察文化等非正式制度对移民创业的影响,如张博和范辰辰(2021)从稻作种植方式差异视角解释了移民创业精神“南盛北衰”的原因,本文从宗族文化视角补充了相关文献。

(2)拓展了宗族文化影响机制的相关文献。不同于过往研究侧重于从信任结构(陈斌开和陈思宇,2018)、集体行动效率(Xu和Yao,2015)和社会道德规范(Chen等,2022)等方面解释宗族文化的影响机制,本文从社会融入的排斥性视角诠释了迁入地宗族文化抑制移民创业的原因,不仅为理解宗族文化经济后果提供了新见解,也丰富了社会融入的相关研究(杨菊华,2015)。

(3)不同于过往文献聚焦于从“拉力”角度探讨迁入地特征对移民创业的影响,如城市包容性(周颖刚等,2020),本文从“推力”角度分析迁入地宗族文化如何影响移民创业,丰富了迁入地“推力”因素的研究,如移民多样性(余玲玲等,2021)。此外,与周颖刚等(2020)、余玲玲等(2021)仅关注移民创业行为不同,本文考察了宗族文化对移民创业选择和创业意愿的影响,拓宽了移民创业的研究视角。

剩余内容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文献回顾、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第三部分为研究设计,第四部分为实证结果,第五部分为机制检验,第六部分为异质性分析,第七部分为结论与政策建议。

二、文献回顾、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一)文献述评

以文化为代表的非正式制度在国家经济增长、金融业发展过程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中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具有以儒家宗族文化为鲜明特征的传统文化(Chen等,2022)。宗族文化在中国历经数千年而不衰,虽然“破四旧”运动中“焚宗谱、捣家庙、拆祠堂”对宗族文化造成了较大冲击,但是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对“续族谱、祭祖先、建祠堂”支持力度的提高,使其燃起了新的生命力。在此背景下,学术界愈发好奇宗族文化在中国经济社会中发挥何种作用。宗族作为乡土中国社会的最基本单元(费孝通,2005),指为了生存和安全目的由父系血缘关系联结而成的群体。梳理文献发现,宗族文化经济后果的相关研究可大致分为两支文献:一支文献聚焦于分析宗族在传统乡村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另一支文献考察了宗族在现代城市社会中发挥的作用^①。

为了辨清宗族文化在传统乡村社会的作用,学者们开展了广泛研究,在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多个领域取得了大量成果,大多认为宗族网络在乡村社会中发挥着积极作用。郭云南和姚洋(2013)、郭云南等(2013)、郭云南等(2014)借助全国农村固定

^① 根据宗族活动范围行政区划的不同,可将宗族分为“乡村宗族”与“城市宗族”。前者指在乡镇及农村地区开展活动的宗族,后者指在县级以上城市的城区或其邻近范围开展活动的宗族(周大鸣,2016)。

观察点调查数据与北京大学国发院进行的村庄选举调查数据,分别考察了农村宗族网络对劳动力流动、自主创业和收入分配的影响。他们研究发现,一定程度上宗族网络在农村地区充当着社会保障和资金调剂平台的角色,其强度的提高会带动农户外出务工和推动农户家庭创业,有助于降低村内收入不平等程度。Su等(2011)利用2005年村庄选举调查数据研究指出,竞争性政治激发了宗族网络在村庄选举中的社会纽带作用,表现为前三大姓氏人口占比较高的村庄投票参与率较高。Tsai(2002,2007)借助一手调查数据研究发现,宗族社会网络的存在有助于解决农村地区公共品供给中的“搭便车”问题,提升农村社会治理水平。Xu和Yao(2015)基于1986—2005年中国乡村民主调查数据研究表明,宗族在提高村庄集体决策效率与增加公共品供给上发挥着积极作用,表现为拥有隶属前两大家族村主任的乡村更易筹集公共品投资资金,并且在宗族凝聚力较强时表现得更为突出。Peng(2004)利用20世纪90年代366个村庄调查数据研究发现,在市场化改革初期,宗族网络有助于保护企业家私有产权和降低交易成本,助推农村地区工业化,表现为以第一大姓人口占比表征的宗族社会网络强度对农村私营企业数量和劳动力雇佣规模具有积极影响。不过,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宗族网络短半径信任和短半径交易的局限会日益凸显,可能会制约乡村企业发展,阮荣平和郑风田(2013)利用200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研究表明,宗族网络强度较高的村庄中企业数量较少。王丹利和陆铭(2020)利用历史上反映宗族多样性的数据和农村公共品私人供给数据研究指出,姓氏数目的增加和姓氏集中度的提高分别与农村公共品私人供给存在负相关和正相关关系。王陈豪等(2020)利用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中姓氏信息构造姓氏集中度指标,研究发现并购双方宗族文化差异的增大会提高企业并购效益,背后的原因在于宗族的排外性赋予了宗族文化浓厚地区的企业以社会资本优势,收购宗族文化浓厚地区的企业有利于外地企业融入本地关系网,提高市场竞争优势。

与学术界聚焦于考察宗族文化在乡村社会中扮演哪些角色形成对比的是,既有文献对宗族文化在城市社会中发挥何种作用的重视程度明显不足。事实上,不仅乡村社会存在宗族文化,城市社会也存在宗族文化(周大鸣,2016),有血缘关系的同姓家庭通过较为频繁的沟通交流,会在城市范围形成宗族社会网络(张心仪等,2021)。城市层面的研究主要关注宗族文化对银行业发展的影响。既有研究分别站在历史和现代的视角审视宗族文化在中国银行业发展中起到的“排斥”效应和“包容”效应。Chen等(2022)以1936年地级市每万人银行数量测度现代银行业发展,以第一家现代银行建立以前(—1897年)家谱密度表征宗族文化,研究发现,宗族文化通过抑制外部金融需求阻碍了中国现代银行业发展。不同的是,刘冲等(2021)以原银保监会提供的银行许可证信息构造地级市层级银行发展水平指标,利用1990年家谱密度测度宗族文化,研究发现传统宗族文化通过扩大居民金融服务需求,推动了现代银行业发展。还有部分研究分析了宗族文化对移民就业和城市犯罪率的影响。陈斌开和陈思宇(2018)以籍贯地城市大姓占比指标衡量宗族文化,研究发现,浓厚的籍贯地宗族文化会提高移民的社会资本水平,推动移民进入异地的低端服务业工作,并且信任是其影响机制。同时,宗族文化也会造成城市犯罪率提高的后果(张心仪等,2021)。

近年来,“乡土中国”向“流动中国”转变的趋势愈发明显,声势浩大的“农民进城”运动已将宗族文化由农村延伸至城市(陈斌开和陈思宇,2018)。在此背景下,鲜有研究详细分析迁入地宗族文化如何影响外来移民创业,仅个别学者对迁入地宗族文化如何影响移民创业略有提及。Zhang(2020)在考察宗族文化对中国家庭创业和私营部门发展的影响时,借助流行病学研究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将籍贯地宗族文化与迁入地宗族文化纳入同一方程后,研究发现籍贯地宗族文化和迁入地宗族文化分别会显著提高和降低跨市级行政区流动移民创业的可能性。不过,由于其研究重心并非探讨迁入地宗族文化对移民创业的影响,故未就迁入地宗族文化抑制移民创业的原因进行详细解释。为了打开迁入地宗族文化影响移民创业的“黑箱”,与Zhang(2020)利用家谱数据衡量宗族文化不同,本文以大姓占比指标测度迁入地宗族文化,减轻了家谱数据非随机缺失导致的衡量偏误问题。

(二)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在回顾社会融入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本文从社会交往、文化接纳和身份认同三种社会融入层次递进地解释迁入地宗族文化如何抑制移民创业。

首先,迁入地宗族文化可能影响移民社会交往。社会交往作为社会融合的最低层次,指移民通过与本地人交往进行社会来往融入迁入地。社会交往默认遵循“人以群分”的标准,相似文化背景的群体具有更广泛的沟通话题和更稳固的信任基础。宗族作为由父系血缘关系联结而成的同姓群体(费孝通,2005),是身份符号的标识之一,具有明确的内部认同和外部边界,更加强调族内成员团结合作(Greif和Tabellini,2010),其形成的宗族文化会对移民社会交往对象产生差异化影响,表现为移民在迁入地面临界限分明的宗族隔阂,较难融入本地宗族圈子,从而会阻碍移民与社会资源相对丰富的本地人进行主动交往,推动移民与社会资源相对稀缺的老乡进行被动交往,不利于移民进行社会网络重构、嵌入本地社会关系网(李国正等,2021),增加了创业成本。因此,迁入地宗族文化可能阻碍移民与当地人的社会交往,从而对移民创业选择和创业意愿产生抑制作用。

其次,迁入地宗族文化可能影响文化接纳。文化接纳作为社会融合的中间层次,指迁入地居民对移民的包容程度和排外情况。外来人口能否融入本地不仅取决于社会参与的积极性,也受迁入地文化接纳的影响。宗族作为串联同一姓氏下具有血缘关系个体的纽带,是一种具有明显内部认同和外部边界的圈子文化(费孝通,2005),表现为不同宗族秉持不同的族规、族训和文化价值观。外来移民在迁出地已经适应了具有本族特色的文化习俗和价值观念,流入迁入地后会面临来自不同宗族文化的“冲击”,需要适应本地文化。迁入地宗族文化越浓,迁出地与迁入地的“文化差异性”越大,当地人对外来人口的包容性越差、排外态度越明显,移民越难在文化层面融入本地,进而会抑制移民创业。

最后,迁入地宗族文化可能影响移民身份认同。身份认同作为社会融合的最高层次,指移民与迁入地居民的心理距离,包括移民对当地的好感程度和融入意愿两个维度。宗族作为“姓氏文化”的产物,是区分身份特征的最显著标识,强调特殊信任而非一

般信任,重视维护族内成员的关系,同宗同族是身份认同的关键所在(王陈豪等,2020)。一方面,处于同一宗族网络内个体的信任感更高,关系更稳固,更易获得身份认同感。另一方面,处于同一宗族网络内个体的心理距离更短,沟通障碍更小,更易达成一致的身份认同。社会交往中可借助宗族的血缘特征和地缘特征判断出彼此是否来自同一地区、是否具有亲缘关系等,更易识别身份特征。迁入地宗族文化越浓,移民与本地人的身份特征差异越大,心理隔阂越明显,身份认同感越低,从而会制约移民的创业选择和创业意愿。

根据上述分析,基于社会融合理论,构建图1所示理论分析框架,并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假说1:迁入地宗族文化对移民创业选择与创业意愿具有负向影响。

假说2:迁入地宗族文化通过阻碍移民社会融入抑制其创业选择与创业意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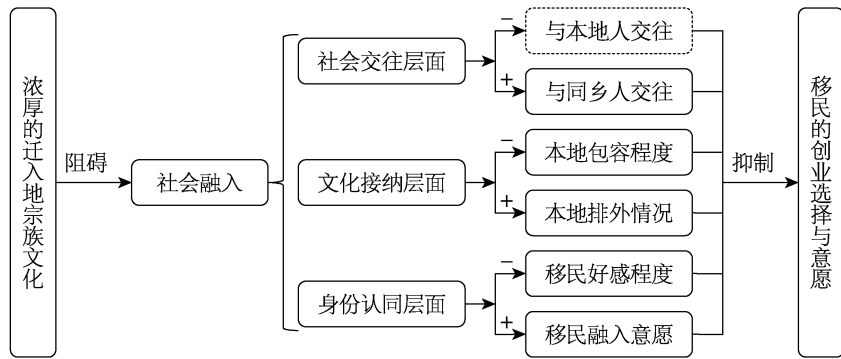


图1 理论分析框架:迁入地宗族文化与移民创业

三、研究设计

(一) 数据来源

本文核心数据包括两部分:其一,宗族文化数据来自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其二,创业相关数据来自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简称CMDS2017)。

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是国家统计局在全国范围内例行开展的人口抽样调查项目,原始样本共包含1699万人,是难得的记录了受访者姓名的大型人口抽样调查或普查数据,可供我们提取受访者姓氏信息,统计不同姓氏人口占比。姓氏作为传承宗族文化的特有符号,过往研究宗族文化经济后果的文献多以不同姓氏人口占比衡量宗族文化浓厚程度,比如第一大姓氏人口占比(Peng,2004)、是否属于第一大姓或第二大姓(Xu和Yao,2015)、第三大姓氏人口占比(陈斌开和陈思宇等,2018)等。为避免以不同姓氏人口占比度量宗族文化带来的衡量偏误问题,本文参考阮荣平和郑风田(2013),分别以地级市层级第一大姓氏人口占比、前两大姓氏人口占比和前三大姓氏人口占比度量迁入地宗族文化。

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是原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现国家卫生健康委

员会)自2009年起每年开展一次的流动人口抽样调查项目,调查样本覆盖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流动人口较为集中的地区,调查内容涉及流动人口及家庭成员人口基本信息、流动范围和趋向、就业和社会保障、收支和迁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婚育和计划生育服务管理、子女流动和教育、心理文化等。此外,国家卫生健康委还进行了流动人口社会融合与心理健康、流出地卫生计生服务、流动老人医疗卫生服务等专题调查,是目前研究中国流动人口创业问题最权威的数据来源之一。

本文选取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的原因有二:一是CMDS2017询问了移民社会融入状况的相关问题,有助于打开迁入地宗族文化影响移民创业的“黑箱”;二是CMDS2017首次公布了流动人口户籍地市级行政区划代码和县级行政区划代码,可控制户籍地城市特征变量,便于识别迁入地宗族文化影响移民创业的因果效应。鉴于宗族文化衡量指标为地级市层级变量,迁入地宗族文化对市内跨县级行政区流动人口创业具有相同影响,因此剔除了市内跨县级行政区流动样本,仅保留跨省级行政区流动和省(区、市)内跨市级行政区流动样本。同时,考虑到本文主要关注迁入地宗族文化对尚处于工作状态的移民非农创业的影响,故剔除了失业和从事农林牧渔行业创业的样本。此外,考虑到年幼者社会阅历不足以支撑创业活动和年老者精力无法满足创业活动需求的情况,将研究对象限制在18—65岁。

(二) 模型设定

为了检验迁入地宗族文化对移民创业的影响,构造如下计量模型,采用Probit模型进行回归分析:

$$\text{Prob}(Y_{ic}) = \alpha_0 + \alpha_1 \text{Clan}_{ic} + \beta' X_i + \text{Industry} + \text{Province} + \text{province} + \varepsilon_{ic} \quad (1)$$

其中,被解释变量 Y_{ic} 为移民 i 在流入地城市 c 的创业状况,包括创业选择和创业意愿;解释变量 Clan_{ic} 为移民 i 所在迁入地 c 的宗族文化,城市指设区地级市或直辖市。 X_i 为控制变量矩阵, β' 为控制变量系数矩阵,参考周颖刚等(2020)、余玲铮等(2021),控制了移民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和城市特征变量。同时,为避免受到随行业和省份变化的不可观测因素影响,本文通过加入移民所在行业和省(区、市)的系列虚拟变量控制了行业固定效应(Industry)、籍贯省(区、市)固定效应(province)和迁入省(区、市)固定效应(Province)。相较于周颖刚等(2020)研究城市包容性对移民创业影响时仅控制行业固定效应和籍贯省(区、市)固定效应、余玲铮等(2021)研究城市移民多样性对创业选择影响时仅控制迁入省(区、市)固定效应而言,本文所控制的固定效应更严格,减轻了遗漏变量问题。

(三) 变量定义

1. 解释变量

创业选择(Entrepreneurship)和创业意愿($\text{Entrepreneurship_will}$)。参考周颖刚等(2020)、余玲铮等(2021)的做法,构造创业选择变量,将就业身份为雇主或自营劳动者的人视为从事创业的移民,并赋值为1,否则为0;进一步,构造创业意愿变量,将未从事创业活动但因经商而流动的移民视为具有创业意愿者,并赋值为1,否则为0。同时,考虑到移民创业存在不同类型,根据过往研究,将移民创业分为机会型创业和生存型创

业,二者均以哑变量衡量,前者以就业身份是否为雇主进行区分,后者以就业身份是否为自营劳动者进行区分^①。

2. 解释变量

迁入地宗族文化(*Clan*)。现有研究主要以大姓人口占比指标(陈斌开和陈思宇等,2018)和族谱密度指标(Zhang,2020)测度宗族文化,考虑到族谱数据可能存在非随机缺失导致的测量误差问题,本文选择以大姓人口占比衡量迁入地宗族文化,数据来自2005年国家统计局进行的1%人口抽样调查,存在测量误差的可能性较小。由于学术界未就使用何种大姓人口占比达成一致意见,为避免产生分歧,参考阮荣平和郑风田(2013),以第一大姓氏人口占比($Clan_1$)、前两大姓氏人口占比($Clan_{1,2}$)和前三大姓氏人口占比($Clan_{1,3}$)表征迁入地宗族文化,占比越高说明宗族文化越浓厚。同时,在稳健性检验中汇报了基于其他大姓占比指标、族谱密度指标以及借助百度指数构造的宗族文化指标的回归结果。

3. 控制变量

为了控制宗族文化以外影响移民创业的因素,结合本文研究主题,参考周颖刚等(2020)、余玲铮等(2021),控制了移民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和迁入地城市特征变量,定义见表1。

表1 控制变量定义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
年龄	调查年份与出生年份差值
性别	男性=1,女性=0
民族	汉族=1,少数民族=0
婚姻状况	已婚=1,其他=0
学历水平	未上学=0,小学=6,初中=9,高中及中专=12,专科=15,本科=16,研究生=19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1,其他=0
健康状况	健康=1,基本健康、不健康但生活能自理、生活不能自理=0
户籍类型	农业户口=1,否则=0
住房状况	有自有住房=1,否则=0
感知歧视	存在被本地人看不起的问题=1,否则=0
父母外出经历	首次外出流动前父母有过外出务工或经商经历=1,否则=0
家庭规模	同住家庭成员数量
家庭收入	$\ln(\text{家庭去年平均月收入}+1)$
家庭支出	$\ln(\text{家庭去年平均月支出}+1)$
城乡类型	城镇地区=1,农村地区=0

① 本文检验了迁入地宗族文化对移民机会型创业和生存型创业的影响,结果表明,迁入地宗族文化对不同类型的移民创业影响无明显不同,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故未在文中进行汇报。具体而言,第一大姓氏人口占比、前两大姓氏人口占比和前三大姓氏人口占比在1%水平上显著减少了机会型创业的可能性,前两大姓氏人口占比和前三大姓氏人口占比在1%水平上显著减少了生存型创业的可能性。

续表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
儒家文化	$\ln(\text{城市孔庙数量}+1)$
经济发展水平	$\ln(\text{城市人均地区生产总值}+1)$
经济增速	城市 GDP 增速(单位:%)
住房价格	$\ln(\text{城市年均住房价格}+1)$
人口规模	$\ln(\text{城市户籍人口数量}+1)$
人口增长率	城市人口自然增长率(单位:%)
高等教育发展	$\ln(\text{城市高等学校在校生数量}+1)$
就业规模	$\ln(\text{城市私营和个体从业人员数量}+1)$
财政透明度	$\ln(\text{政府全口径财政透明度指数}+1)$
政商关系	$\ln(\text{城市政商关系总指数}+1)$

为了解变量分布特征和计算解释变量经济含义,表 2 汇报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从移民创业来看,平均而言,以雇主或自雇形式从事创业活动的移民占 36.41%,未创业移民中具有创业意愿的人占 28.48%。从宗族文化来看,宗族文化在中国具有深厚基础,体现在第一大姓氏人口占比、前两大姓氏人口占比和前三大姓氏人口占比的均值分别为 11.23%、19.59%和 26.76%,但较高的标准差也说明不同城市宗族文化存在一定差异。

表 2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名称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i>Entrepreneurship</i>	88 145	0.3641	0.4812	0	1
<i>Entrepreneurship_will</i>	77 607	0.2848	0.4513	0	1
<i>Clan₁</i>	88 145	0.1123	0.0964	0.0567	0.9777
<i>Clan_{1_2}</i>	88 145	0.1959	0.0943	0.1077	0.9810
<i>Clan_{1_3}</i>	88 145	0.2676	0.0943	0.1534	0.9835
<i>Interaction_local</i>	88 145	0.2836	0.4507	0	1
<i>Interaction_townee</i>	88 145	0.3681	0.4823	0	1
<i>Inclusion</i>	88 145	3.2394	0.6228	1	4
<i>Exclusion</i>	88 145	1.9426	0.7272	1	4
<i>Favor_degree</i>	88 145	3.3796	0.5681	1	4
<i>Integration_will</i>	88 145	3.3047	0.6368	1	4

四、实证结果

(一) 基准回归结果

表 3 汇报了迁入地宗族文化影响移民创业的基准回归结果。其中,第(1)列至第

(3)列被解释变量为创业选择,第(4)列至第(6)列被解释变量为创业意愿;第(1)列和第(4)列解释变量为迁入地第一大姓氏人口占比,第(2)列和第(5)列解释变量为迁入地前两大姓氏人口占比,第(3)列和第(6)列解释变量为迁入地前三大姓氏人口占比。

结果表明,从统计意义来看,迁入地宗族文化在1%水平上显著降低了移民创业的可能性,迁入地第一大姓氏人口占比、前两大姓氏人口占比和前三大姓氏人口占比对移民创业选择的边际影响分别为-0.5719、-0.4504和-0.4453,对移民创业意愿的边际影响分别为-0.7052、-0.4501和-0.4594。从经济意义来看,迁入地第一大姓氏人口占比、前两大姓氏人口占比和前三大姓氏人口占比每提高1个标准差,移民创业选择相较于其均值分别下降15.14%、11.67%和11.53%,移民创业意愿相较于其均值分别下降23.87%、14.90%和15.21%^①。可知,迁入地宗族文化对移民创业的抑制作用具有显著的统计意义和经济意义。

此外,我们不禁要问:流入地宗族文化对移民创业的挤出效应,是否由流入地宗族文化推动移民从事正规就业成为雇员造成?有研究指出,宗族文化作为一种流动的社会资本,会在流入地创造更多的正规就业机会,推动移民进入流入地低端服务业就业(陈斌开和陈思宇,2018)。不过,需要清楚的是:他们研究的是流出地宗族文化对移民就业的影响,而非流入地宗族文化对移民就业的影响。根据人口迁移的推拉理论,流出地宗族文化和流入地宗族文化作为一对反作用力,在影响移民创业上起着相反的作用,如果流出地宗族文化会推动外来人口从事正规就业成为雇员,那么流入地宗族文化则不利于外来人口从事正规就业成为雇员。因此,也就排除了替代性解释,即流入地宗族文化越强,正规就业机会越多,创业选择越少。

表3 基准回归结果

被解释变量	<i>Entrepreneurship</i>			<i>Entrepreneurship_will</i>		
	(1) <i>Clan</i> ₁	(2) <i>Clan</i> _{1,2}	(3) <i>Clan</i> _{1,3}	(4) <i>Clan</i> ₁	(5) <i>Clan</i> _{1,2}	(6) <i>Clan</i> _{1,3}
<i>Clan</i>	-0.5719*** (0.1608)	-0.4504*** (0.0901)	-0.4453*** (0.0848)	-0.7052*** (0.1434)	-0.4501*** (0.0809)	-0.4594*** (0.0761)
控制变量和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88 145	88 145	88 145	77 607	77 607	77 607

注:*** $p < 0.01$, ** $p < 0.05$, * $p < 0.1$;括号中是迁入地城市层级聚类稳健标准误;系数为平均边际效应估计结果。

(二) 内生性问题

本文研究的重点是考察迁入地宗族文化如何影响移民创业。基准回归结果显示,迁入地宗族文化显著降低了移民创业的概率与意愿。但是,这一回归结果可能面临内生性问题的挑战。在计量经济学中,内生性可能来自三个方面:双向因果、测量误差和遗漏变量。

^① $15.14\% = -0.5719 \times 0.0964 / 0.3641$, $11.67\% = -0.4504 \times 0.0943 / 0.3641$, $11.53\% = -0.4453 \times 0.0943 / 0.3641$, $23.87\% = -0.7052 \times 0.0964 / 0.2848$, $14.90\% = -0.4501 \times 0.0943 / 0.2848$, $15.21\% = -0.4594 \times 0.0943 / 0.2848$ 。

就双向因果而言,考虑到宗族文化建立在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的基础之上,现实中存在移民在迁入地组建家庭并融入当地宗族的可能性。为避免此反向因果问题的出现,本文选用匹配不同的数据源进行检验,利用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构造大姓人口占比指标衡量迁入地宗族文化,并同CMDS2017数据进行匹配,克服了双向因果导致的估计偏误。

就测量误差而言,本文数据集包括移民创业和宗族文化两部分。前者依托中国最具代表性的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该调查由原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现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负责执行,数据质量较高,存在测量偏误的样本较少;后者依托国家统计局执行的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构造大姓占比指标,普查数据具有全国层面良好的代表性,宗族文化指标测量误差较小。

就遗漏变量而言,在基础回归中控制了可能影响移民创业的个人特质(如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和户籍类型等)和家庭特质(如父母外出经历、家庭收入和家庭支出等),缓解了个体层面的遗漏变量问题;同时,控制了部分影响移民创业的迁入地城市特征变量(如儒家文化、经济发展、住房价格、人口规模、就业状况和政商关系等);此外,还控制了行业固定效应、籍贯省(区、市)固定效应和迁入省(区、市)固定效应,消除了由不可观测的行业和地区特征造成的遗漏变量问题。不过,遗漏变量问题仍然可能成为导致内生性问题的原因。本文采用控制潜在的遗漏变量和构造新的工具变量两种方式解决上述问题。

1. 控制遗漏变量

过往研究指出,异地创业存在外来人口创业活跃度高于本地人的“过江龙”现象,地区差距会影响移民创业,比如迁入地与籍贯地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和制度环境差异的增大会提高异地创业的可能性(叶文平等,2018),忽视地区差距可能会低估迁入地宗族文化对移民创业的影响。为此,在基准回归中加入迁入地与籍贯地经济距离、地理距离和制度距离变量,见表4 Panel A。其中,经济距离以迁入地城市与籍贯地城市人均GDP差值衡量(叶文平等,2018);地理距离以迁入地城市与籍贯地城市空间距离衡量,进行加1取对数处理;制度距离以籍贯地城市制度环境与迁入地城市制度环境差值衡量,制度环境以GDP与政府预算内财政支出的比值表示(叶文平等,2018)。结果表明,在控制经济距离、地理距离和制度距离后宗族文化指标对移民创业的影响变化不大,仍在1%水平上降低了创业概率和创业意愿,说明基本上不存在由地区差距导致的遗漏变量问题。

同时,如陈斌开和陈思宇(2018)所言“籍贯地的推力因素与迁入地的拉力因素可能会对移民创业共同产生影响”。为此,本文在基准回归基础上加入籍贯地城市变量,包括第一大姓氏人口占比、前两大姓氏人口占比、前三大姓氏人口占比、儒家文化、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增速、住房价格、人口规模、人口增长率、高等教育发展、就业规模、财政透明度和政商关系等,考察“推力因素”是否会左右迁入地宗族文化对移民创业的影响,变量定义见表1,结果见表4 Panel B。结果表明,在控制籍贯地城市特征变量后,第一大姓氏人口占比、前两大姓氏人口占比和前三大姓氏人口占比在5%或1%显著性水平上降低了移民创业概率与创业意愿。

表4 控制遗漏变量

被解释变量	<i>Entrepreneurship</i>			<i>Entrepreneurship_will</i>			
	<i>Clan</i> =	(1) <i>Clan</i> ₁	(2) <i>Clan</i> _{1,2}	(3) <i>Clan</i> _{1,3}	(4) <i>Clan</i> ₁	(5) <i>Clan</i> _{1,2}	(6) <i>Clan</i> _{1,3}
Panel A(控制城市间经济距离、地理距离和制度距离)							
<i>Clan</i>		-0.6269*** (0.1694)	-0.4760*** (0.0952)	-0.4587*** (0.0894)	-0.6821*** (0.1526)	-0.4331*** (0.0859)	-0.4426*** (0.0808)
<i>Distance_economics</i>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i>Distance_geographical</i>		0.0122*** (0.0023)	0.0120*** (0.0023)	0.0118*** (0.0023)	0.0125*** (0.0021)	0.0123*** (0.0021)	0.0122*** (0.0021)
<i>Distance_institutional</i>		0.0016 (0.0013)	0.0015 (0.0013)	0.0016 (0.0013)	0.0007 (0.0011)	0.0006 (0.0011)	0.0007 (0.0011)
控制变量和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79 773	79 773	79 773	70 132	70 132	70 132
Panel B(控制籍贯地城市特征变量)							
<i>Clan</i>		-0.4434** (0.1812)	-0.3668*** (0.0994)	-0.5453** (0.2594)	-0.6155*** (0.1617)	-0.3803*** (0.0893)	-0.3851*** (0.0843)
控制变量和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籍贯地城市特征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68 493	68 493	68 493	60 436	60 436	60 436

注:*** $p<0.01$, ** $p<0.05$, * $p<0.1$;括号中是迁入地城市层级聚类稳健标准误;系数为平均边际效应估计结果。如无特殊说明,后文控制变量和固定效应设定均同基准回归。

2. 工具变量法

此外,本文还尝试构造工具变量来缓解遗漏变量造成的内生性问题。具体而言,从科举制度作为商业宗族实现集体利益主要途径的角度出发,构造清朝府级每万人中进士数量(*Jinshi_per*)作为宗族文化的工具变量^①,结果见表5,进士数据来自哈佛大学等建立的“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进士数量的人口量纲数据来自《中国人口史(第五卷清时期)》(葛剑雄和曹树基,2001)。理论依据如下:

从相关性看,本文认为进士密度与宗族文化存在正相关性。背后的逻辑在于,中国传统社会是典型的农业社会,历代统治阶级都奉行重农抑商的政策,从事商业活动被认为是“弃本逐末”的行为,入“士”是宗族实现光宗耀祖的主要途径^②。具体而言,科举制度作为宗族实现士商融合和名利双收的渠道,具有实现宗族集体利益的作用,是明清时

① 选取清顺治时期至清光绪时期进士数据的原因在于:第一,清朝府级行政区划与当前行政区划差异最小;第二,清朝在历代封建王朝中距今最近,对当今经济社会的影响最为直接,数据最为翔实可靠。为避免人口规模带来的影响,以葛剑雄和曹树基(2001)统计的1776年、1820年、1851年、1880年和1910年府级人口数量的均值作为进士数量的人口量纲,最终得到186个府级行政区(约略相当于今天的地级市行政区)每万人中进士数量数据。

② 四民制度,指的是古代中国的四种公民,分别指士、农、工、商。

期商业家族进入官僚系统、建构地域性政商关系网络的唯一途径,步入“士”阶层(也可称为科甲及第)即可贵为四民之首,享有最高的社会地位和最大的社会影响力,有助于为宗族乃至地域的商业活动提供有力的政治庇护,如处理商业诉讼、帮助筹建商业会馆和争取有利的商业机会等,从而提高了宗族对子弟教育的重视程度。在此背景下,家族对子弟教育的重视不会仅停留在观念层面,还会通过动用族内财产兴办私塾等公益事业的方式提供优质教育资源,助力实现金榜题名、叩开官僚系统大门的最终目标。因此,本文认为科甲及第的巨大利益诱惑和高昂的学习成本负担,会提高宗族内部凝聚力和统一协调效率,增加宗族文化厚重程度、扩大宗族文化传播范围,表现为进士密度较高的地区具有更为浓厚的宗族文化。从外生性看,进士密度是迁入地清朝时期的历史特征,而移民创业是当今的外来人口行为,在控制了大量迁入地城市层级变量后,具有较强的外生性。

第一阶段表明,Wald 外生性检验显著拒绝了无内生性问题的原假设,第一阶段 F 值远大于 10% 水平上弱工具变量的临界值,并且进士密度在 1% 水平上显著提高了第一大姓氏人口占比、前两大姓氏人口占比和前三大姓氏人口占比,说明工具变量选取适当,基本上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第二阶段表明,第一大姓氏人口占比、前两大姓氏人口占比和前三大姓氏人口占比在 5% 水平上降低了移民创业概率,在 1% 水平上降低了移民创业意愿,支持了基准回归结果。工具变量法回归系数略大于基准回归系数的原因可能是,“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作为一项史料数据库可能并未囊括全部进士信息,从而导致低估了研究结果。

表 5 工具变量法结果

被解释变量	Entrepreneurship			Entrepreneurship_will		
	(1) $Clan_1$	(2) $Clan_{1,2}$	(3) $Clan_{1,3}$	(4) $Clan_1$	(5) $Clan_{1,2}$	(6) $Clan_{1,3}$
$Clan =$						
$Clan$	-5.6276 ** (2.2607)	-1.8204 ** (0.7193)	-2.1276 ** (0.8434)	-7.7456 *** (1.8403)	-2.6142 *** (0.6056)	-2.9934 *** (0.6981)
第一阶段结果						
$Jinshi_per$	0.001 *** (0.000)	0.004 *** (0.000)	0.004 *** (0.000)	0.001 *** (0.000)	0.004 *** (0.000)	0.004 *** (0.000)
Wald 外生性检验	6.13 **	5.16 **	5.49 **	17.48 ***	15.03 ***	15.83 ***
第一阶段 F 值	3 799.63	3 476.66	5 160.32	3 327.48	2 997.96	4 457.72
Adj R^2	0.8625	0.8516	0.8950	0.8617	0.8488	0.8930
控制变量和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66 007	66 007	66 007	58 200	58 200	58 200

注: *** $p < 0.01$, ** $p < 0.05$, * $p < 0.1$; 括号中是 two-step 标准误; 系数为平均边际效应估计结果, 控制变量和固定效应同表 3。

(三) 稳健性检验

1. 宗族文化指标稳健性检验

(1) 考虑到现有文献并未就使用何种大姓人口占比衡量宗族文化达成一致意见,

比如 Peng(2004)、Xu 和 Yao(2015)、陈斌开和陈思宇等(2018)分别以第一大姓氏人口占比、是否属于第一大姓或第二大姓、第三大姓氏人口占比刻画宗族网络。为避免由此造成的衡量偏误问题,本文汇报了基于前四大姓氏人口占比($Clan_{1,4}$)、前五大姓氏人口占比($Clan_{1,5}$)和前六大姓氏人口占比($Clan_{1,6}$)的结果,见表 6 Panel A。结果表明,在控制了基准回归中相同的变量和固定效应后,前四大姓氏人口占比、前五大姓氏人口占比和前六大姓氏人口占比在 1%水平上显著降低了移民创业的概率与意愿。

(2) 本文利用百度指数构造迁入地宗族文化($Clan_baiduindex$)指标,见表 6 Panel B。其中,第(1)列和第(3)列被解释变量分别为创业选择和创业意愿,控制变量同基准回归,控制了行业固定效应、籍贯省(区、市)固定效应和迁入省(区、市)固定效应。指标构造的理论依据在于,网民的搜索数据是需求的反映,可以用于现状追踪和趋势预测(Ripberger,2011),因此以百度指数刻画宗族文化的相对发展趋势具备合理性。具体而言,根据宗族文化的内涵与外延,选取反映宗族文化的 36 个关键词^①,按照“关键词+地级市(直辖市)”的方式统计出各地级市(直辖市)上述关键词的 2016 年百度搜索指数,然后将各关键词的百度指数在地级市(直辖市)层面进行加总,并进行加 1 取对数处理以降低右偏分布可能导致的估计偏差,得到基于百度搜索指数的迁入地宗族文化指标,取值越大表明宗族文化越浓。结果表明,在控制了基准回归相同的变量和固定效应后,基于百度搜索指数构造的迁入地宗族文化变量分别在 1%和 5%水平上显著降低了移民创业的概率与意愿。

(3) 参考 Chen 等(2022)、Zhang(2020)以族谱密度测度宗族文化的思路,本文构造迁入地族谱密度($Genealogy$)指标,结合历年 CMDS 数据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见表 6 Panel C,控制了行业固定效应、籍贯省(区、市)固定效应、迁入省(区、市)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②。其中,第(1)列数据为 2013—2016 年 CMDS 混合截面数据,第(2)列数据为 2013—2017 年 CMDS 混合截面数据。第(1)列表明迁入地族谱密度在 5%水平上降低了移民创业的概率,第(2)列表明迁入地族谱密度在 1%水平上抑制了移民创业意愿。

表 6 宗族文化指标稳健性检验

Panel A						
被解释变量	<i>Entrepreneurship</i>			<i>Entrepreneurship_will</i>		
	(1) $Clan_{1,4}$	(2) $Clan_{1,5}$	(3) $Clan_{1,6}$	(4) $Clan_{1,4}$	(5) $Clan_{1,5}$	(6) $Clan_{1,6}$
<i>Clan</i>	-0.5015 *** (0.0824)	-0.4478 *** (0.0811)	-0.3494 *** (0.0789)	-0.4473 *** (0.0751)	-0.3512 *** (0.0735)	-0.2278 *** (0.0711)
样本量	88 145	88 145	88 145	77 607	77 607	77 607

① 宗族文化相关的关键词:祭祖、祠堂、宗族、族谱、家谱、宗谱、家族、宗、神庙、祖庙、宗亲、家族名字、大家族、宗法制、家族史、宗室、同族、家族企业、祠堂文化、家训、家规、家书、义庄、家风、家法、氏族、宗亲会、寻根、寻根问祖、修谱、家谱网、家谱查询、联姻、祖坟、上坟和祭拜。

② 迁入地族谱密度($Genealogy$)以流入城市每百人拥有的族谱数量表示,族谱数量统计的是明朝至 1990 年各城市族谱数量。其中,族谱数据来自上海图书馆“家谱知识服务平台”,人口数据来自《中国人口史(第五卷清时期)》(葛剑雄和曹树基,2001)。

续表

Panel B		
被解释变量	(1) <i>Entrepreneurship</i>	(2) <i>Entrepreneurship_will</i>
<i>Clan_baiduindex</i>	-0.0168 *** (0.0056)	-0.0102 ** (0.0049)
样本量	88 145	77 607
Panel C		
被解释变量	<i>Entrepreneurship</i>	
	(1) CMDS2013-2016	(2) CMDS2013-2017
<i>Genealogy</i>	-0.0767 ** (0.0353)	-0.0953 *** (0.0319)
样本量	286 967	350 008

2. 工具变量稳健性检验

为了增强内生性处理部分的稳健性,本文构造了其他工具变量来克服遗漏变量问题。具体而言,以1933—1934年迁入省份农村地区粮食借贷月利率的倒数(*Grain lending rates*)作为宗族文化的工具变量^①,粮食借贷利率数据来自《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严中平等,1955),结果见表7。

背后的逻辑在于,在20世纪30年代,物资相对匮乏,家庭饮食结构中花费在主食上的消费占比较高,小麦和水稻等粮食价格的高低会影响加工后的主食价格,影响居民家庭的饮食成本。在粮食交易市场化程度较低的时代背景下,受供需关系影响的粮食借贷利率直接决定粮价高低,从而会影响宗族生存成本和繁荣程度,比如因自然灾害导致的“粮荒”会迫使宗族外迁至粮食资源充沛的地区定居,以减小生存压力。因此,本文认为粮食借贷利率会影响宗族文化的繁荣程度,低粮食借贷利率降低了宗族生存成本,有助于宗族文化的延展与传播。从外生性来看,粮食借贷利率是迁入地的历史特征,创业是外来移民的当前行为,在控制了大量个体、家庭和迁入地城市特征变量后,粮食借贷利率基本上不会通过宗族文化以外的渠道影响移民创业。由于本文使用的是截面数据,而农村粮食借贷月利率是民国时期迁入省份特征变量,为避免多重共线性,未控制迁入省(区、市)固定效应。

第一阶段表明,Wald外生性检验显著拒绝了无内生性问题的原假设,第一阶段F值远大于10%水平上弱工具变量的临界值,并且农村地区粮食借贷月利率的倒数在1%水平上显著提高了第一大姓氏人口占比、前两大姓氏人口占比和前三大姓氏人口占比,说明工具变量选取适当,基本上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第二阶段表明,第一大姓氏人口占比、前两大姓氏人口占比和前三大姓氏人口占比在1%水平上显著降低了移民创业概率与意愿,支持了基准回归结果。

^① 由于本文使用的是截面数据,而农村地区粮食借贷月利率的倒数为民国时期迁入省份特征变量,故此无法控制迁入省(区、市)固定效应。在控制了大量迁入地城市特征变量后,未控制迁入省(区、市)固定效应不会带来较大影响。

表7 替换工具变量

被解释变量	Entrepreneurship			Entrepreneurship_will		
	(1) <i>Clan</i> ₁	(2) <i>Clan</i> _{1,2}	(3) <i>Clan</i> _{1,3}	(4) <i>Clan</i> ₁	(5) <i>Clan</i> _{1,2}	(6) <i>Clan</i> _{1,3}
<i>Clan</i> =						
<i>Clan</i>	-2.0865*** (0.7031)	-1.0607*** (0.3584)	-0.6600*** (0.2226)	-2.5046*** (0.6399)	-1.2944*** (0.3298)	-0.8014*** (0.2040)
第一阶段结果						
<i>Grain lending rates</i>	0.069*** (0.002)	0.136*** (0.003)	0.219*** (0.003)	0.068*** (0.002)	0.131*** (0.003)	0.212*** (0.004)
Wald 外生性检验	5.99**	7.13***	12.35***	10.67***	11.02***	14.21***
第一阶段 F 值	727.41	735.80	1 013.43	641.19	649.78	898.53
Adj <i>R</i> ²	0.4638	0.4666	0.5466	0.4626	0.4659	0.5468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籍贯省(区、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71 389	71 389	71 389	63 225	63 225	63 225

五、机制检验

为了打开迁入地宗族文化影响移民创业的“黑箱”,本文从社会融入视角进行检验:第一步考察迁入地宗族文化对移民社会融入的影响,第二步考察社会融入对移民创业的影响。社会融入指外来移民融入当地主流社会,与主流社会群体平等共享经济社会资源,并在社会认知上去差异化的过程(崔岩,2012)。过往研究指出社会融入包括多个维度,比如:杨菊华(2015)认为,社会融入包括经济融合、社会适应、文化习得和心理认同四个方面,且存在依次递进的关系;Zou和Deng(2022)认为,社会融入包括经济融合、文化融合、社会安全、社会关系和心理融合五个方面。参考刘金凤和魏后凯(2020)、杨菊华(2015),按照依次递进的关系,将社会融入分为社会交往、文化接纳和身份认同三个维度,考察其在迁入地宗族文化影响移民创业过程中发挥的作用。

(一) 迁入地宗族文化对移民社会融入的影响

为了检验迁入地宗族文化对移民社会融入的影响,构造如下计量模型:

$$Society_Integration_{ic} = \alpha_0 + \alpha_1 Clan_{ic} + \beta' X_i + Industry + Province + province + \varepsilon_{ic} \quad (2)$$

其中,被解释变量 *Society_Integration*_{ic} 为社会融入,包括社会交往、文化接纳和身份认同三个方面;解释变量 *Clan*_{ic} 为第一大姓氏占比、前两大姓氏占比和前三大姓氏占比。结果见表8,第(1)列和第(4)列解释变量为第一大姓氏占比,第(2)列和第(5)列解释变量为前两大姓氏占比,第(3)列和第(6)列解释变量为前三大姓氏占比。

1. 迁入地宗族文化对移民社会交往的影响

宗族文化以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为依托,具有身份标识作用,对移民交往人群可能

有差异化影响,比如推动同乡间的交往、减少与本地人的交往。因此,根据社会交往对象的不同,将移民的主要社会交往对象分为本地人和同乡两类,见表8 Panel A。其中,第(1)列至第(3)列被解释变量为与本地人交往(*Interaction_local*),第(4)列至第(6)列被解释变量为与同乡交往(*Interaction_townee*)^①。

结果表明,第一大姓氏人口占比在1%水平上降低了移民与本地人交往的概率,前两大姓氏人口占比和前三大姓氏人口占比对移民与本地人交往的影响不显著,见第(1)列至第(3)列;第一大姓氏人口占比、前两大姓氏人口占比和前三大姓氏人口占比分别在1%、5%和5%水平上提高了移民与同乡交往的概率,见第(4)列至第(6)列。可知,迁入地浓厚的宗族文化会阻碍移民与本地人进行社会交往,推动移民与同乡进行社会交往。

2. 迁入地宗族文化对移民文化接纳的影响

宗族文化具有身份标识作用,流入地浓厚的宗族文化造就了明显的“圈子文化”,导致本地人对外地人包容程度下降和排斥态度上升的后果,不利于提升移民在文化接纳层面融入本地社会。为此,本文从本地人对外地人包容性和排外性两方面考察迁入地宗族文化对移民文化接纳的影响,见表8 Panel B。其中,第(1)列至第(3)列被解释变量为本地人包容程度(*Inclusion*),取值越大表明本地人对外来人口包容性越高,第(4)列至第(6)列被解释变量为本地人排外程度(*Exclusion*),取值越大表明本地人对外来人口排外性越高^②。表8 Panel B结果表明,第一大姓氏人口占比、前两大姓氏人口占比和前三大姓氏人口占比在5%水平上显著降低了本地人对外来人口的包容程度,见第(1)列至第(3)列;第一大姓氏人口占比、前两大姓氏人口占比和前三大姓氏人口占比在1%水平上显著提高了本地人排外程度,见第(4)列至第(6)列。可知,迁入地宗族文化增大了移民的文化适应难度。

3. 迁入地宗族文化对移民身份认同的影响

流入地浓厚的宗族文化可能不利于移民在心理层面融入当地,造成身份认同障碍。为了考察迁入地宗族文化对移民身份认同的影响,构造外来人口好感程度(*Favor_degree*)和外来人口融入意愿(*Integration_will*)两个指标衡量身份认同状况,取值越大表明移民对本地的好感程度越高、外来人口融入意愿越强^③。结果表明,第一大姓氏人口占比在10%水平上降低了外来人口对本地的好感程度,前两大姓氏人口占比和前三大姓氏人口占比对外来人口好感程度的负向影响不显著,见第(1)列至第(3)列;前两大姓氏人口占比和前三大姓氏人口占比在10%水平上降低了外来人口融入意愿,第一大

① 与本地人交往(*Interaction_local*):在业余时间和本地人交往最多,赋值为1,否则为0。与同乡交往(*Interaction_townee*):在业余时间和同乡交往最多,赋值为1,否则为0。同乡包括户口迁至本地、户口在老家和户口迁至其他地区的三类人。

② 本地人包容程度(*Inclusion*):以对“本地人愿意接受我成为其中一员”观点的同意程度衡量,完全不同意=1、不同意=2、基本同意=3、完全同意=4。本地人排外程度(*Exclusion*):以对“我感觉本地人看不起外地人”观点的同意程度衡量,完全不同意=1、不同意=2、基本同意=3、完全同意=4。

③ 外来人好感程度(*Favor_degree*):以对“喜欢现迁入城市/地方”看法的同意程度衡量,完全不同意=1、不同意=2、基本同意=3、完全同意=4。外来人融入意愿(*Integration_will*):以对“很愿意融入本地人,成为其中一员”看法的同意程度衡量,完全不同意=1、不同意=2、基本同意=3、完全同意=4。

姓氏人口占比对外来人口融入意愿的负向影响不显著,见第(4)列至第(6)列。可知,迁入地宗族文化提高了移民身份认同难度。

表8 机制检验:迁入地宗族文化对移民社会融入的影响

<i>Clan</i> =	(1) <i>Clan</i> ₁	(2) <i>Clan</i> _{1,2}	(3) <i>Clan</i> _{1,3}	(4) <i>Clan</i> ₁	(5) <i>Clan</i> _{1,2}	(6) <i>Clan</i> _{1,3}
Panel A(宗族文化对社会交往的影响)						
被解释变量	<i>Interaction_local</i>			<i>Interaction_townee</i>		
<i>Clan</i>	-0.4548 *** (0.1544)	-0.0765 (0.0891)	-0.0664 (0.0825)	0.7031 *** (0.2175)	0.2709 ** (0.1187)	0.2663 ** (0.1141)
样本量	88 156	88 156	88 156	88 156	88 156	88 156
Panel B(宗族文化对文化接纳的影响)						
被解释变量	<i>Inclusion</i>			<i>Exclusion</i>		
<i>Clan</i>	-0.5907 ** (0.2876)	-0.3565 ** (0.1620)	-0.3322 ** (0.1583)	2.7986 *** (0.3228)	1.4089 *** (0.1812)	1.3084 *** (0.1767)
样本量	88 156	88 156	88 156	88 156	88 156	88 156
Panel C(宗族文化对身份认同的影响)						
被解释变量	<i>Favor_degree</i>			<i>Integration_will</i>		
<i>Clan</i>	-0.4285 * (0.2493)	-0.2170 (0.1365)	-0.0444 (0.1313)	-0.2170 (0.2999)	-0.2860 * (0.1663)	-0.2664 * (0.1614)
样本量	88 156	88 156	88 156	88 156	88 156	88 156

(二) 社会融入对移民创业的影响

接下来,构造方程(3)所示的计量模型,检验社会交往、文化接纳和身份认同三种社会融入状况对移民创业的影响,结果见表9。其中,Panel A和Panel B被解释变量分别为移民创业选择和移民创业意愿;第(1)列至第(6)列解释变量依次是与本地人交往、与同乡交往、本地人包容程度、本地人排外程度、外来人口好感程度和外来人口融入意愿。

$$\text{Prob}(Y_{ic}) = \alpha_0 + \alpha_1 \text{Society_Integration}_{ic} + \beta' X_i + \text{Industry} + \text{Province} + \text{province} + \varepsilon_{ic} \quad (3)$$

首先,分析社会交往对移民创业的影响。结果表明,移民与本地人交往的增加分别在1%和5%水平上提高了移民创业的概率和意愿,与同乡交往的增加在5%水平上降低了移民创业的概率,对移民创业意愿的影响不显著。

其次,检验文化接纳对移民创业的影响。结果发现,本地人包容程度在1%水平上提高了移民创业的概率和意愿,本地人排外程度分别在10%和5%水平上减少了移民创业的概率和意愿。与周颖刚等(2020)研究结论一致,他们基于CMDS2016数据构造城市包容性指标,研究发现,城市包容性的改善会推动移民创业。

最后,考察身份认同对移民创业的影响。结果显示,外来人口好感程度分别在1%和5%水平上提高了移民创业的概率和意愿,外来人口融入意愿的增加在1%水平上显著提高了移民创业的概率和意愿。

结合迁入地宗族文化对社会融入影响的结果,可知社会交往机制、文化接纳机制和身份认同机制成立,即宗族文化通过削弱移民与本地人的社会交往和增强移民与同乡的社会交往、降低本地人包容性和提高本地人排外性、提高身份认同难度三大途径,阻碍移民创业。

本地宗族文化通过阻碍社会融入抑制移民创业的作用机制,在现实中存在着典型案例。例如,潮汕地区作为中国宗族文化的代表地区之一,因青壮年多从事出海捕鱼作业,家中妻儿老小需要基于亲缘与血缘关系的族人相互照应,故形成了联系密切的内部宗族网络,这一宗族网络给外来人口增加了诸多社会融入壁垒,比如潮汕方言造成外来人口难以在社会交往、文化接纳和身份认同等方面融入本地。同时,潮汕地区的产业结构以服装制造和玩具生产等低端制造业为主,进入门槛和技术含量低,较低的行业壁垒使得本地人更愿意把生产环节的下游链条承包给血缘关系更近的族人而非流入本地的外来创业者,从而挤出了移民创业。

表9 机制检验:社会融入对移民创业的影响

Panel A(社会融入对移民创业选择的影响)						
被解释变量	<i>Entrepreneurship</i>					
<i>Interaction_local</i>	0.0112 *** (0.0026)					
<i>Interaction_townee</i>		-0.0050 ** (0.0023)				
<i>Inclusion</i>			0.0060 *** (0.0018)			
<i>Exclusion</i>				-0.0029 * (0.0016)		
<i>Favor_degree</i>					0.0074 *** (0.0020)	
<i>Integration_will</i>						0.0070 *** (0.0018)
样本量	88 145	88 145	88 145	88 145	88 145	88 145
Panel B(社会融入对移民创业意愿的影响)						
被解释变量	<i>Entrepreneurship_will</i>					
<i>Interaction_local</i>	0.0093 ** (0.0042)					
<i>Interaction_townee</i>		-0.0024 (0.0033)				
<i>Inclusion</i>			0.0111 *** (0.0026)			

续表

Panel B(社会融入对移民创业意愿的影响)						
被解释变量	<i>Entrepreneurship_will</i>					
<i>Exclusion</i>	-0.0051 ** (0.0023)					
<i>Favor_degree</i>	0.0069 ** (0.0029)					
<i>Integration_will</i>	0.0088 *** (0.0026)					
样本量	77 607	77 607	77 607	77 607	77 607	77 607

六、异质性分析

(1) 流动类型异质性检验表明,第一大姓氏人口占比、前两大姓氏人口占比和前三大姓氏人口占比在1%水平上显著降低了由农村向城市流动(也称“乡—城”流动)移民的创业概率与意愿,对城市向城市流动(也称“城—城”流动)移民创业选择与意愿无显著影响。其中,“乡—城”流动移民指流入城市且具有农业户籍的移民,“城—城”流动移民指流入城市且具有非农业户籍的移民。可能的解释是:一方面,“乡—城”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水平低于“城—城”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水平(杨菊华,2015);另一方面,“乡—城”流动人口比“城—城”流动人口面临更大的宗族文化差异。

(2) 流动范围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第一大姓氏人口占比、前两大姓氏人口占比和前三大姓氏人口占比在1%水平上显著降低了跨方言大区流动移民的创业概率和意愿,对同方言大区内流动移民的创业选择和意愿无显著影响^①。Wei等(2019)借助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研究发现,熟悉迁入地方言有助于移民融入当地社会网络,减少创业“壁垒”,更可能从事创业活动。原因可能是,相较于跨方言大区流动的移民而言,同方言大区内流动移民的户籍地方言与迁入地方言相似度更高,面临的沟通障碍更少,具有更高的永久迁移意愿,有助于提高身份认同感、降低社会融入难度,推动异地创业。

(3) 流动区域异质性分析表明,第一大姓氏人口占比、前两大姓氏人口占比和前三大姓氏人口占比在1%水平上显著降低了跨省级行政区流动移民的创业概率和意愿,对省(区、市)内跨市级行政区流动移民的创业选择和意愿无显著影响。可能的解释是,一

^① 方言数据来自中山大学岭南学院产业与区域经济研究中心官网,由刘毓芸等(2015)根据《汉语方言大词典》系统整理所得。《汉语方言大词典》将汉语方言从粗到细依次分为方言大区、方言区、方言片,按照1986年的行政区划记录了各县级行政区方言。本文按照2017年中国各县级行政区的行政代码对方言数据和CMDS数据进行匹配,剔除无法识别地区代码的方言数据和方言残缺数据。具体来看,中国汉语方言分为官话、晋语、赣语、徽语、吴语、闽语、湘语、客家话、粤语和平话10个方言大区,北京官话等25个方言区,京师片等109个方言片。如果迁入地县级行政区和籍贯地县级行政区属于同一方言大区,则流动范围视为同方言大区内流动,如果属于不同方言大区,则流动范围视为跨方言大区流动。

方面,相较于省(区、市)内跨市级行政区流动的移民而言,跨省级行政区流动的移民创业概率更高。根据 CMDS2017 计算发现,平均来看,省(区、市)内跨市级行政区流动群体中从事创业活动的移民占 36.80%,同一指标在跨省级行政区流动群体中为 51.10%,比前者高 14.30 个百分点。另一方面,相较于省(区、市)内跨市级行政区流动移民而言,跨省级行政区流动移民所面临的制度环境差异更大,社会融入难度更高。虽然内生性处理部分未发现城市间制度距离会显著影响移民创业,但是差异更大的省(区、市)间制度环境会使移民面临更高的适应性成本,比如需要花费更长的时间习惯迁入地的制度约束(陈斌开和陈思宇,2018)。因此,迁入地宗族文化对跨省级行政区流动移民创业的抑制作用更突出。

(4) 流动方向异质性分析发现,第一大姓氏人口占比、前两大姓氏人口占比和前三大姓氏人口占比分别在 5%、1%和 5%水平上显著提高了流入北方地区移民创业的概率,前两大姓氏人口占比和前三大姓氏人口占比在 1%水平上显著提高了流入北方地区移民创业的意愿,第一大姓氏人口占比、前两大姓氏人口占比和前三大姓氏人口占比在 1%水平上显著降低了流入南方地区移民创业的概率和创业意愿。可能的原因是:南方地区比北方地区的宗族网络结构更紧凑、宗族文化更浓,以地缘和亲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族网络联系更密切,同等条件下可能更加排斥外来人口。比如,华南地区的宗族以聚居为主,地方性规范较强、封闭性较高,这种团结型的血缘组织结构筑成了无形的融入壁垒,排斥外来人口从事竞争性的创业活动,而华北地区的宗族以未出五服的小亲族为核心,这种分裂型的小亲缘集团的排外性相对较低(贺雪峰,2017)。北方地区宗族文化之所以会促进移民创业,可能是北方平原地区因交通便捷、地形简单和人口聚集,宗族势力更易被工业化和城镇化瓦解掉,导致多数宗族实际上“名存实亡”,少数宗族依靠族内能人建立的家族企业或产业才得以保留。为提升族内凝聚力和壮大集体力量,需要外来人口的流入来发挥“鲑鱼效应”,以竞争促团结进取,从而推动了移民创业。

表 10 异质性分析结果

<i>Clan</i> =	(1) <i>Clan</i> ₁	(2) <i>Clan</i> _{1,2}	(3) <i>Clan</i> _{1,3}	(4) <i>Clan</i> ₁	(5) <i>Clan</i> _{1,2}	(6) <i>Clan</i> _{1,3}
Panel A(流动类型异质性)						
被解释变量	<i>Entrepreneurship</i>					
流动类型	城—城流动			乡—城流动		
<i>Clan</i>	-0.0393 (0.3755)	0.1520 (0.1925)	0.0817 (0.1835)	-0.6432 *** (0.1800)	-0.5272 *** (0.1042)	-0.4939 *** (0.0977)
样本量	19 573	19 573	19 573	68 563	68 563	68 563
被解释变量	<i>Entrepreneurship_will</i>					
流动类型	城—城流动			乡—城流动		
<i>Clan</i>	-0.4270 (0.3256)	0.0117 (0.1654)	-0.0272 (0.1585)	-0.7580 *** (0.1626)	-0.5327 *** (0.0961)	-0.5238 *** (0.0897)
样本量	17 687	17 687	17 687	59 673	59 673	59 673

续表

<i>Clan</i> =	(1) <i>Clan</i> ₁	(2) <i>Clan</i> _{1,2}	(3) <i>Clan</i> _{1,3}	(4) <i>Clan</i> ₁	(5) <i>Clan</i> _{1,2}	(6) <i>Clan</i> _{1,3}
Panel B(流动范围异质性)						
被解释变量	<i>Entrepreneurship</i>					
流动范围	同方言大区內流动			跨方言大区流动		
<i>Clan</i>	0.3060 (0.3530)	-0.2370 (0.2049)	-0.2550 (0.2007)	-0.8534 *** (0.1818)	-0.4949 *** (0.1000)	-0.4657 *** (0.0938)
样本量	33 771	33 771	33 771	54 374	54 374	54 374
被解释变量	<i>Entrepreneurship_will</i>					
流动范围	同方言大区內流动			跨方言大区流动		
<i>Clan</i>	-0.0265 (0.3338)	-0.2800 (0.1910)	-0.2870 (0.1897)	-0.8996 *** (0.1586)	-0.4816 *** (0.0889)	-0.4815 *** (0.0831)
样本量	29 373	29 373	29 373	48 150	48 150	48 150
Panel C(流动区域异质性)						
被解释变量	<i>Entrepreneurship</i>					
流动区域	省(区、市)內跨市流动			跨省级行政区流动		
<i>Clan</i>	0.1530 (0.2839)	-0.0976 (0.1693)	-0.2180 (0.1650)	-0.6725 *** (0.1954)	-0.4314 *** (0.1051)	-0.3567 *** (0.0987)
样本量	33 189	33 189	33 189	54 952	54 952	54 952
被解释变量	<i>Entrepreneurship_will</i>					
流动区域	省(区、市)內跨市流动			跨省级行政区流动		
<i>Clan</i>	-0.0075 (0.2799)	-0.0985 (0.1625)	-0.2070 (0.1597)	-0.7267 *** (0.1678)	-0.4137 *** (0.0925)	-0.3797 *** (0.0865)
样本量	29 309	29 309	29 309	48 227	48 227	48 227
Panel D(流动方向异质性)						
被解释变量	<i>Entrepreneurship</i>					
流动区域	流入北方地区			流入南方地区		
<i>Clan</i>	1.0728 ** (0.5432)	1.0524 *** (0.3778)	0.6296 ** (0.2676)	-0.8934 *** (0.1733)	-0.5532 *** (0.0944)	-0.5279 *** (0.0912)
样本量	32 529	32 529	32 529	53 220	53 220	53 220
被解释变量	<i>Entrepreneurship_will</i>					
流动区域	流入北方地区			流入南方地区		
<i>Clan</i>	0.7490 (0.4811)	0.9924 *** (0.3260)	0.7226 *** (0.2319)	-0.9195 *** (0.1558)	-0.5088 *** (0.0854)	-0.5177 *** (0.0827)
样本量	27 937	27 937	27 937	47 717	47 717	47 717

七、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移民创业创造的大量就业机会在扩大本地就业市场规模、提高就业质量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改善社会融合状况有助于打造适合移民创业的外部环境。文化差异作为影响社会融合的重要因素,可能会制约移民创业选择与意愿,本文主要考察迁入地宗族文化是否会通过社会融入机制作用于移民创业。研究发现,在控制了行业固定效应、籍贯省(区、市)固定效应和迁入省(区、市)固定效应后,迁入地宗族文化显著降低了移民创业的概率与意愿。机制分析表明,迁入地宗族文化通过增加移民的社会融入难度抑制创业。异质性检验发现,相较于“城—城”流动、同方言大区内流动和省(区、市)内跨市级行政区流动的移民而言,“乡—城”流动、跨方言大区流动和跨省级行政区流动的移民面临更高的社会融入难度,创业选择与创业意愿受迁入地宗族文化的负向影响更大;相较于流入北方地区的移民而言,流入南方地区的移民面临更突出的排外性问题,创业选择与创业意愿受迁入地宗族文化的负向影响更大。

在采取控制潜在的遗漏变量和利用工具变量法缓解内生性问题后,本文仍可能存在如下不足之处:第一,本文使用的是截面数据,而非针对移民的追踪调查数据,虽然控制了大量个人和家庭特征变量,但是无法通过控制个体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来避免受不随时间变动的个体特征影响;第二,由于国家统计局仅在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中收集了姓氏信息,而随后的十余年里人口出现了明显的跨地区流动现象,宗族文化可能发生了些许变化。

本文的研究结论为激发移民创业精神、推动新型城镇化发展提供了些许思考:

(1) 从迁入地角度来看,要注重引导以宗族或姓氏为界限的“圈子文化”的良性发展,塑造宜居宜业的社会融合环境,破除非制度性障碍,减轻宗族文化壁垒对外来人口创业的阻力,尤其是对于“乡—城”流动、跨省级行政区流动、跨方言大区流动和流入南方地区的人口。在20世纪90年代市场化改革初期,宗族网络起到了保护企业家私有产权和降低交易成本的作用,推动了农村地区工业化(Peng, 2004)。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宗族网络短半径信任效应和短半径交易效应的劣势逐渐凸显,不仅会阻碍家族企业跨地区经营,还对外来人口经营企业筑起了无形的屏障。因此,地方政府必要时需做出合理引导,减轻创业市场的“宗族身份歧视”,在制定相关政策时做到“对内对外”一视同仁,向本地企业和外来企业提供同等均质的公共服务。

(2) 从户籍地角度来看,要意识到离乡务工到返乡创业的环境变化,重视县域补短板强弱项,推动以县域为载体的城镇化建设,通过“搭好平台、造好环境、搞好保障”吸引更多“燕归巢”,充分发挥返乡创业人员的就业带动效应,为实现乡村振兴增添新动能。迁入地宗族文化通过阻碍社会融入抑制移民创业,被挤出的移民可能会选择回乡创业,而回到家乡县级行政区或乡镇行政区政府所在地往往是其首选^①。因此,以县域为重要

^① 根据2017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不打算留在本地的移民中有66%的人选择返乡,返乡群体中分别有17%和10%的人打算回到县级行政区所在地和乡镇行政区所在地,并且因创业返乡的占比高达14%。

载体推进返乡移民就近就地创业显得尤为重要,不仅能够解决宗族文化冲突带来的社会融入问题,平衡好顾家和就业,激发游子的返乡创业精神,还契合新形势下政府推进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创业的政策精神,发挥返乡创业人员创业带动就业的作用,为乡村振兴添砖加瓦。例如,地方政府应结合实际情况,分析自身适合通过产业转移、输出地产业升级、输出地资源嫁接输入地市场、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等返乡创业模式中的哪一种或哪几种,打造具有特色的返乡创业就业模式,吸引更多的外出务工人员从事创业活动。

参 考 文 献

- Chen, J. and M. Hu, 2021, "City-Level Hukou-Based Labor Market Discrimination and Migrant Entrepreneurship in China," *Technologic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Economy*, 27(5): 1095-1118.
- Chen, Z., C. Ma and A. J. Sinclair, 2022, "Banking on the Confucian Clan: Why China Developed Financial Markets So Late," *The Economic Journal*, 132(644): 1378-1413.
- Greif, A. and G. Tabellini, 2010, "Cultural and Institutional Bifurcation: China and Europe Compared,"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0(2): 135-140.
- Peng, Y., 2004, "Kinship Networks and Entrepreneurs in China's Transitional Econom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9(5): 1045-1074.
- Ripberger, J. T., 2011, "Capturing Curiosity: Using Internet Search Trends to Measure Public Attentiveness," *Policy Studies Journal*, 39(2): 239-259.
- Su, F., T. Ran, X. Sun and M. Liu, 2011, "Clans, Electoral Procedures and Voter Turnout: Evidence from Villagers' Committee Elections in Transitional China," *Political Studies*, 59(2): 432-457.
- Tsai, L. L., 2002, "Cadres, Temple and Lineage Institutions, and Governance in Rural China," *The China Journal*, 48(7): 1-27.
- Tsai, L. L., 2007, "Solidary Groups, Informal Accountability, and Local Public Goods Provision in Rural China,"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01(2): 355-372.
- Wei, X., Y. Jiao and G. Growe, 2019, "Language Skills and Migrant Entrepreneurship: Evidence from China,"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53(4): 981-999.
- Xu, Y. and Y. Yao, 2015, "Informal Institutions, Collective Action, and Public Investment in Rural China,"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09(2): 371-391.
- Zhang, C., 2020, "Clans, Entrepreneurship, and Development of the Private Sector in Chin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48(1): 100-123.
- Zou, J. and X. Deng, 2022,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and Driving Forces of Migrants' Socio-Economic Integration in Urban China: Evidence from CMDS,"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159(3): 1035-1056.
- 陈斌开和陈思宇,2018,《流动的社会资本——传统宗族文化是否影响移民就业?》,《经济研究》第3期 35—49页。
- 崔岩,2012,《流动人口心理层面的社会融入和文化接纳问题研究》,《社会学研究》第5期 141—160+244页。
- 费孝通,2005,《乡土中国》,北京出版社。
- 葛剑雄和曹树基,2001,《中国人口史(第五卷清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
- 郭云南和姚洋,2013,《宗族网络与农村劳动力流动》,《管理世界》第3期 69—81+187—188页。
- 郭云南、张琳弋和姚洋,2013,《宗族网络、融资与农民自主创业》,《金融研究》第9期 136—149页。
- 郭云南、姚洋和 Jeremy Foltz,2014,《宗族网络与村庄收入分配》,《管理世界》第1期 73—89+188页。
- 贺雪峰,2017,《南北中国:中国农村区域差异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李国正、韩文硕、艾小青和迟远英,2021,《社会关系网络重构与流动人口创业活动——作用机理与政策含义》,《人

- 口与经济》第3期1—17页。
- 刘冲、刘莉亚和李庆宸,2021,《“排斥”还是“包容”:传统宗族文化与现代银行发展》,《经济研究》第4期110—125页。
- 刘金凤和魏后凯,2022,《方言距离如何影响农民工的永久迁移意愿——基于社会融入的视角》,《中国农村观察》第1期34—52页。
- 刘毓芸、徐现祥和肖泽凯,2015,《劳动力跨方言流动的倒U型模式》,《经济研究》第10期134—146+162页。
- 阮荣平和郑风田,2013,《市场化进程中的宗族网络与乡村企业》,《经济学(季刊)》第1期331—356页。
- 万海远和李实,2013,《户籍歧视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经济研究》第9期43—55页。
- 王陈豪、王轶和李红波,2020,《宗族文化与企业并购收益》,《会计研究》第2期101—116页。
- 王丹利和陆铭,2020,《农村公共品提供:社会与政府的互补机制》,《经济研究》第9期155—173页。
- 严中平、徐义生、姚贤镐、孙毓棠、汪敬虞、李一诚、宓汝成、聂宝璋、李文治、章有义和罗尔纲,1955,《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
- 杨菊华,2015,《中国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研究》,《中国社会科学》第2期61—79+203—204页。
- 叶文平、李新春和朱沆,2018,《地区差距、社会嵌入与异地创业——“过江龙”企业家现象研究》,《管理世界》第1期139—156页。
- 余玲铮、娄世艳、王建楠和魏下海,2021,《城市的移民多样性与创业选择》,《经济科学》第2期135—147页。
- 张博和范辰辰,2021,《稻作与创业:中国企业家精神南北差异的文化起源》,《财贸经济》第6期71—86页。
- 张心仪、孙伟增和陈思宇,2021,《传统宗族文化是否影响城市犯罪率?》,《世界经济文汇》第2期71—87页。
- 周大鸣,2016,《从乡村宗族到城市宗族——当代宗族研究的新进展》,《思想战线》第2期1—7页。
- 周敏慧、Jean-Louis Arcand和陶然,2017,《企业家精神代际传递与农村迁移人口的城市创业》,《经济研究》第11期74—87页。
- 周颖刚、蒙莉娜和林雪萍,2020,《城市包容性与劳动力的创业选择——基于流动人口的微观视角》,《财贸经济》第1期129—144页。